

#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 苏联共产党组织路线调整的历史镜鉴

王立新\*

〔摘要〕 戈尔巴乔夫实行以民主化、自由化、选举制为核心的组织路线是苏共败亡的组织因素。在改革的重要转折时期,苏共应当采取科学正确的组织路线,不能全盘否定广大干部,要努力培育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干部队伍,防止组织工作中的个人集权化和极端民主化,防止干部选任中的个人专断和自由放任;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改变干部监督缺位、乏力的状况,完善以选举制为核心的选任制度,建立健全全面有效的干部监督制度;要清除封建主义的官僚文化,培育社会主义公仆文化。

〔关键词〕 戈尔巴乔夫;组织路线;民主化;自由化

在苏联剧变的诸多原因中,一般认为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政治原因,而政治路线需要一定的组织路线加以具体实施,深入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共产党组织路线与苏联剧变的关系,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总结苏共败亡的原因和教训。

## 一、戈尔巴乔夫调整苏联共产党组织路线的背景

一般而言,组织路线始终服务于政治路线。在十月革命之前,为了夺取政权,苏联共产党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政治路线,苏共通过建立集中制、委任制等制度,组织广大干部团结带领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组织广大干部团结带领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因此,苏联共产党的组织路线在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展开,改革逐渐成为苏共面临的一项新的重要政治任务。在孤立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的、落后的封建因素、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激烈的党内

---

\* 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97。

斗争等因素的影响,加上思想认识方法的片面性,在苏联逐步形成了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即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苏联模式曾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改革成为必然。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首先启动了改革,但是由于他缺乏理论指导,方法运用不当,加上阻力较大,被迫于1964年下台,改革陷入失败。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都未能有效地推进改革,在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开展、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之际,苏联却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时期,丧失了改革和发展的良好机遇。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后,面对苏联社会严峻的形势,确定了全面改革的政治路线,对苏联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当时苏联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和组织状况并不能适应全面改革的需要。

1. 干部队伍严重老化。由于勃列日涅夫放弃了赫鲁晓夫对干部进行的任期制和轮换制的改革,苏共干部实际上又回到了终身制,勃列日涅夫执政长达十八年,到了他执政后期,从上至下,苏共干部队伍普遍老化。19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三位苏联最高领导人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相继去世。“1976年苏共25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连任的占83.4%,如果去掉逝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的比例达到90%,26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是25大的原班人马。从1965—1984年间,大部分政治局委员的任期达15年以上,大部分中央委员的任期达12年以上。中央委员中任期最长的达25年和34年。80年代初,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为70岁”<sup>①</sup>。其他苏共干部也是在领导岗位上长期任职,年龄偏大,从而形成老人集团,“病夫治国”。

2. 相当一部分干部思想僵化保守。由于实行干部终身制,加上受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广大干部普遍认为苏联已经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在这种“超阶段论”的影响下,他们封闭保守,安于现状,妄自尊大,对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浪潮茫然无知,对苏联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视而不见,认为苏联没有什么可以需要改革的,缺乏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

3. 任人唯亲现象普遍。由于苏共实行干部委任制,加上党内高度集权,干部自上而下层层委派,事实上下级干部的任免往往由少数甚至个别上级领导决定,结果造成干部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许多干部为了捞取官职,不愿意埋头苦干,踏实工作,而是把走上层路线作为一条捷径,唯上是从,竭力讨好甚至巴结上司,寻找靠山。上级为了寻求支持和帮助,往往只提拔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干部。结果造成干部队伍中拉帮结派,不讲原则,结党营私,裙带风盛行。

4. 干部腐败现象严重。由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权力缺乏监督,越来越多的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全国性的大案要案连续发生。例如:1980年代初破获的“黑鱼子酱走私案”涉及政府众多部门300多名干部,“乌兹别克黑手党”案件涉及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等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包括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女儿、女婿都涉及重大腐败案件。还有不少干部侵吞国有资产,从事非法经营。据估计,在1980年代初,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经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决定了干部只需要对上负责,导致不少干部丧失公仆意识,脱离群众,道德水平低下,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的人数大约有50—70万人。

5. 基层组织软弱涣散。虽然苏共自上而下的党的组织体系很健全,基层组织遍布全国的企业、机关和乡村,但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广大基层干部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信仰衰退,作风散漫,党的组织制度、组织生活徒具形式,名存实亡。基层组织只是简单地服从上级的决定,不愿意到广大群众中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战斗力,难以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

面对软弱、涣散、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党组织,戈尔巴乔夫认识到:若要贯彻全面改革的政治

---

<sup>①</sup>陈之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路线,保障改革的有效实施,必须调整苏共的组织路线,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领导和带头作用,改革党的干部政策,对干部队伍进行清理和整顿,建设一支具有改革思想、实干精神和创新思维的干部队伍,为全面改革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 二、戈尔巴乔夫调整苏联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内容和后果

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组织路线的调整是围绕政治路线的变化而展开。在上台伊始,他就确立了改革路线,起初这一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在1985年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就确立了改革的基调,他指出,苏联自1970年代以来就形成“障碍机制”,出现了全面的停滞趋势;必须改革管理和计划工作,改进工作作风,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加速苏联社会发展。在1986年召开的苏共27大上,戈尔巴乔夫认为党和国家的实际行动落后于时代和生活本身的要求,承认苏联过去的失误,指出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戈尔巴乔夫进一步认识到干部工作在改革中的重要性。1987年1月,他专门召开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研究干部问题,并在会上作了《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提出新形势下必须及时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解决干部问题,不能片面地以专业知识考察干部。到了1990年,戈尔巴乔夫确立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把改革带离了社会主义轨道,苏共的组织路线也发生了严重偏离,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浪潮下,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党内大肆活动,纷纷占据重要领导岗位,进而分裂苏共,苏共的组织路线走进了死胡同。具体而言,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共产党组织路线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以改革作为评判干部的重要标准。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认识到干部是推动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干部对待改革的立场和态度决定改革的成败。他要求广大干部转变观念,掌握新的工作方法,并明确指出,“改革的成败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干部如何迅速和深刻地认识改革的必要性,如何创造性地和目标明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sup>①</sup>“对改革的态度,对推进改革采取的实际行动,是评价干部的决定性标准”<sup>②</sup>。

2. 干部选任和培训必须重视政治理论素养思想道德。此前苏联共产党干部选任和培训中往往看他们是否懂得生产、科学和技术,是否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出现片面重视专业的现象。戈尔巴乔夫认为,“我们不能允许轻视干部的组织理论素养和思想道德锻炼的现象。否则会在作为政治领导机关的党委会的活动中造成最严重的混乱。”<sup>③</sup>在挑选、配备和教育干部时,不应当忽视“思想理论视野和政治上的成熟程度、道德品质和说服并带领人的能力”。<sup>④</sup>

3. 大批撤换干部。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短短两年中,就更换了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的几乎所有成员、大部分书记处成员以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部分部长。苏共27大选出的中央委员307人,其中新当选的135人,占44%。中央候补委员107人,其中新当选的117人,占69%。在1988年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又免除了葛罗米柯等5名老资格的领导人的职务。主管意识形态的利加乔夫由于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反而被调整为主管农业工作。雅科夫列夫取代利加乔夫主管意识形态后,在1986—1988年间,大幅度调整《真理报》《消息报》等苏联最有影响的一批报刊主编和编辑,换上了自由派人士。西化思想严重、后来推行“休克疗法”的盖达尔当时居然就被任命负责苏联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员》杂志及苏联共产党主要报纸《真理报》。在1989年4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为了有利于改革事业,又决定110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辞职。

---

<sup>①②③④</sup>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5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0、22、21、21页。

4. 抛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民主制。自列宁以来,苏联共产党一直实施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这有利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把民主化提到首要地位,继而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无条件民主化,接着在1990年2月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提出“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将重点放在民主化和党员群众的权利上”<sup>①</sup>。在同年7月召开的二十大上正式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样苏共党员可以横向组织活动,按纲领进行联合。苏党二十大还规定了各个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实行党组织自治原则,拥有独立性,它们除了与苏联共产党有着共同的“纲领性原则”之外,都可以自行“制定自己的纲领和文件,独立解决政治、组织、干部、宣传和财政问题”,如果它们不同意中央的决议可以不执行。

5. 废除干部委任制,实行选举制。戈尔巴乔夫在民主化原则的指导下,在1987年就主张废除干部委任制,实行选举制,要求从地方到中央都应当实行差额选举,民主化应当涉及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组成,尤其是地方党组织的第一书记也要在相应的党委会的全体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这样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可以针对苏共执政的错误,利用选举舞台攻击苏共,夺取政治权力。1989年,苏联首次通过差额选举推选第一届人民代表,叶利钦成功当选,许多地方党委书记纷纷落马。在1990年的苏共28大中央委员会选举中,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一批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领导人落选,民主派人士不断通过竞选夺取了政治权力。

实践证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共产党的组织路线所进行的调整是不成功的,不仅其组织路线的调整方向是错误的,而且其方法也是片面的;不仅其调整的速度过快,而且其调整的步子太大。这导致一批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干部被撤换,造成苏联共产党放弃了对地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的领导权,苏联共产党各级党组织软弱、涣散、分裂,失去战斗力,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健康力量无法有效组织起来与错误路线展开斗争,致使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当选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乘机夺取了对苏联的领导权。

### 三、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历史镜鉴

历史已经证明,戈尔巴乔夫盲目、草率、过快、片面地调整苏共组织路线是不成功的。他的这一做法,不仅缺乏原则性和现实性,也缺乏继承性和辩证性,为后人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1. 努力培育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干部队伍,既不能对他们全盘否定也不能放任自流。戈尔巴乔夫为了推进改革,对苏联共产党干部采取了从全面否定到放任自流的做法。他先是全面否定干部,在加速战略失败后,他认为苏联经济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从基层企业到上层管理部门的涣散和不负责上,他把1800万各级管理人员中的相当一部分看成改革的阻力,对大批他所认为的思想保守的干部予以撤职,换上所谓的改革派干部,后来甚至把整个苏联共产党视为改革前进和社会发展的“阻碍机制”。改革后期又对干部采取放任自流政策,放弃了对干部工作的领导。这是一种简单、片面、草率的做法。党的广大干部,是经过党多年培养、锻炼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是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领导力量和中坚力量,而且占据着各级重要领导岗位。因此,必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紧紧依靠他们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紧紧依靠他们推进改革。同时,必须采取全面辩证的方法认识看待党的干部队伍。对于思想僵化保守的干部,应当通过思想教育和实践示范,把他们培育成坚定拥护改革的干部队伍。轻率地对干部予以简单否定,把他们撤换,推向对立面,只会

---

<sup>①</sup>《苏联共产党中央二月全会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4页。

导致反对改革的队伍不断扩大,而主张改革的队伍不断缩小,甚至成为孤家寡人。在改革过程中,面对干部思想僵化保守的状况,一方面应通过思想教育,转变干部的思想观念,确立改革创新意识,另一方面应通过改革实践,引导示范广大干部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意义,从而拥护改革并积极投身改革。苏联共产党组织路线发生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在撤换大批干部后,任命了一批具有自由化思想的干部,他们以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为代表。雅科夫列夫的自由化倾向早已暴露,但是戈尔巴乔夫不仅对他委以重任,而且受其影响。戈尔巴乔夫采纳并实施了雅科夫列夫关于设立总统制、司法独立等一系列的建议主张。这反映了戈尔巴乔夫没有认清具有自由化思想干部否定共产党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没有与他们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把他们清除出党。同时,这也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没有用社会主义改革思想武装干部,统一思想,凝心聚力,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干部思想混乱必然导致组织混乱,其结果是导致各种不同思想的人各自聚集在一起,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形成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和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党组织走向了分裂并最终瓦解。因此,我们今天必须明白:社会主义改革是对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的重大调整,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又要创新社会主义体制,在这一转折时期,广大干部必然会产生不同思想认识,为了防止思想混乱及行动混乱,必须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主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要求他们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勇于改革,大胆创新,成为社会主义改革坚强领导者和有力执行者。

2.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防止组织工作中的个人集权化和极端民主化。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重要组织原则,是民主基础上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要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既有利于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又有效维护了党的统一和团结,是保持党的战斗力的坚强保证。要把充分发扬民主和有效实行集中结合起来,既要防止极端民主化,又要防止个人集权化,发扬民主时要充分酝酿,要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不能借集中为名搞个人集权,随意否定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看法,又要在集中指导下实行民主,不能借民主为名实行自由主义,否定统一领导。发扬民主,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赋予群众知情权和选择权,让群众对干部有充分的了解,切实保障群众的提名权、监督权,将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干部工作绩效和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标准。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把群众零散的、众多的意见归纳汇总,加以集中概括,形成比较统一的意见,确保党内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戈尔巴乔夫错误地调整苏共组织路线的历史事实表明:一方面,个人集权化对苏联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和险恶的战争环境的影响,苏联共产党党内形成了事实上的集中制。在横向上,党内权力集中在党内各级主要领导人手中,在纵向上,党内权力集中在党中央。这一体制要求多数人服从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用少数人甚至个人的智慧代替多数人的智慧,往往导致重大决策失误。此前如斯大林的个人集权给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带来了很大的灾难,而戈尔巴乔夫的个人集权更是使他凌驾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之上,他通过确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改变了苏联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放弃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酿下了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极端民主化又导致苏联共产党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大权在握后,推行民主化的改革路线,推行无条件民主化,提出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并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八大党章中删除了民主集中制的条款,推行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结果导致党组织软弱涣散,允许派别产生,造成党组织联邦化,从而使苏联共产党丧失了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导致党内有派、党外有党的局面,致使苏联共产党走向分崩离析。

3. 完善以选举制为核心的选任制度,防止干部选任中的个人专断和自由放任。在干部选任上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决防止任何个人集权和极度民主化。首先,必须打破自上而下的委任制,

完善民主选任制。权力的来源方向决定了权力负责方向。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决定了干部对上级委任者负责,而不需要对党和人民负责,该制度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干部选拔任用中往往由个别主要领导人的好恶决定。委任制实际上是人治,是不可靠的,它必然导致任人唯亲,拉帮结派,造成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媚上欺下,脱离群众,惟命是从,“跑官”、“要官”现象大量出现,只能导致用人腐败,更为严重的还会导致亡党亡国。因此,只有改变干部对上负责的制度,建立人民群众民主推选干部的制度,才能改变这一不良局面,更能始终保持干部队伍的生机和活力,自动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年龄老化和思想僵化。其次,必须改变选人用人的随意性,制定完善一整套选人用人管人的制度。苏联共产党从高层到基层干部的选任普遍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这种人治在对干部任命上权力过于集中,由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说了算,但在干部任命之后对干部的管理却松懈不到位。以戈尔巴乔夫为例,由于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选拔缺乏一套明确具体的制度,他实际上就是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等少数人推荐的,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承认在他升迁过程中安德罗波夫“插了一手”。在同时代的苏联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并不是出类拔萃的,“苏联解体的事实已经确切无疑地证明,无论是领导能力、政策水平,或者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他都是不胜任的。”<sup>①</sup>戈尔巴乔夫当任后,几乎缺乏任何监督,安德罗波夫等人的眼力失误就铸成了大错。戈尔巴乔夫当任后,任用雅科夫列夫等一批在民主派分子,其他具有能力和正确见解的人没有机会掌握权力、担当重任,在剧变的大潮中往往束手无策,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只能望洋兴叹、随波逐流。因此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由个别人或少数人决定不一定可靠往往带有个人色彩,必须坚持民主原则,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既不能以票取人,也不能由主要领导个人决定。要严格制定提名、酝酿、讨论、任用等一系列制度,按照制度通过程序确定干部。要正确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一方面要正确地任命干部,通过发扬民主原则,走群众路线,努力选拔出德才兼备的干部。另一方面要科学地管理干部,建立干部的任期、轮岗、交流、福利、退休和奖惩等制度,加强对干部的有效管理。

4. 改变干部监督缺位、乏力的状况,建立健全全面有效的干部监督制度。腐败的权贵阶层最终不会拥护其所在的社会制度,必须把他们坚决清理出去。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共产党内部就逐步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起初该阶层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会努力维护现有的制度。但后来实际该权贵阶层已经蜕化变质,丧失了理想、信念和党的基本原则。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90年,西方民意机构对10万人左右的苏联党政精英作了调查,“只有9.6%的人主张坚持社会主义,12.3%的人主张坚持民主社会主义,高达76.7%的人希望实行资本主义。”<sup>②</sup>因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开始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sup>③</sup>为了确保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摇身一变,企图推动社会制度的演变,使他们手中掌握的国有资源合法化,并能让子女合法地继承他们的财富。可见,腐败分子只是以其利益为中心,毫无共产主义信念和马克思主义立场原则可言,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唯利是图,不可能是改革的依靠力量,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更不可能领导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相反只会朝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的发展。执政的共产党应当坚决清除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消除隐患。同时,必须在共产党内部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虽然苏联共产党颁布了完备的监督制度,建立了系统的监督机构,设立了众多的监督渠道,形成了全面的监督网络,但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由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主要负责人掌握大权,基本上所有的监督都形同虚设,监督机关、下级、群众、新闻媒体无权、无法、无力监督。这导致各级党委主要领导人大权独揽,为所欲为,其错误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日

<sup>①</sup>陈之骅等:《苏联兴亡史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19页。

<sup>②</sup>李慎明:《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20周年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5页。

<sup>③</sup>[美]大卫·科茨:《苏联解体的原因》,《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

积月累,危害日益严重。必须恢复列宁时期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党的委员会平行的体制架构,建立相对独立的垂直的党内监督体系,赋予其充足的权力和相对独立性,使其能够对各级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开展有效的监督。从根本上看,应当改革党内高度集权的体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党委会集体领导制,赋予下级、党员群众充分的民主权利和监督权力,拓展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等多样化的监督途径,对广大干部进行广泛、有力的监督。

5. 培育社会主义公仆文化,清除封建主义的官僚文化。仅仅依靠既得利益是无法保持干部对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和支持的,必须在广大干部中牢固确立社会主义信仰。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苏联共产党长期执政,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失误和现实体制机制中的问题,使越来越多的干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衰退。苏联后期,相当一部分干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为了追求利益而跻身苏联干部队伍,为了获得更多利益拥护社会主义,信奉的都是升官发财的封建文化。如果仅仅依靠利益是无法保证广大干部持久拥护社会主义,特别是特权阶层、腐败分子,放任他们攫取国有资源和民众利益来换取对社会主义的拥护无疑是饮鸩止渴,实践证明,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就是被他们破坏的,社会主义墙角就是被他们挖空的。由于他们贪得无厌,随着利益的调整变化和特权的废除,特别是对腐败的打击,他们表面上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会随之变化,他们不但会消极抵制,甚至会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只有在广大干部中牢固确立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才能确保他们始终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而与此同时,也必须在广大干部中消除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封建主义文化,培育为民务实清廉的公仆文化。苏联共产党干部队伍在落后的封建文化影响下出现逆淘汰,一代不如一代,队伍严重不纯,思想保守僵化,能力水平较低,缺乏担当创新,优秀干部无法脱颖而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应当努力消除封建主义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干部选任上的圈子文化、臣民文化、依附文化、阿谀文化等,大力培育社会主义公仆文化,在干部选任中倡导公开、公正、公平,在干部队伍中弘扬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文化,并切实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建立健全干部选任制度,加以贯彻落实,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干部中落地生根。

(责任编辑:杨嵘均)

## Historical Lessons from the CPSU's Adjustment of Organizational Line in the Gorbachev Era

WANG Li-xin

**Abstract:** The organizational line featuring democratization, liberalization, and electoral system championed by Gorbachev is the organizational factor causing the downfal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CPSU).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the reform, the Party should adopt a scientifically correct organizational line. Instead of abandoning the majority of the cadres, they ought to make efforts to encourage those cadres to uphold socialism, and rid the organizational work of one-man dictatorship and extreme democratization, as well as arbitrary decisions and the laissez-faire approach to the selection of cadres. Also, the Party should stick to the democratic centralism, and change the state of inadequate and ineffective cadre supervision through improving the selection process and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supervision system. Moreover, it is a must to eliminate the feudal bureaucracy and develop a socialist culture of public servant.

**Key words:** Gorbachev; organizational line; democratization; liberalization